



#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



周丽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研究部)

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经过多次野外发掘工作的开展,对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为良渚文化分期补充了很多新的材料。

良渚文化遗存在广富林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大,Ⅱ区主要是良渚墓葬区,大致情况已作报道<sup>①</sup>,不再赘叙,这里主要讨论Ⅰ区的良渚晚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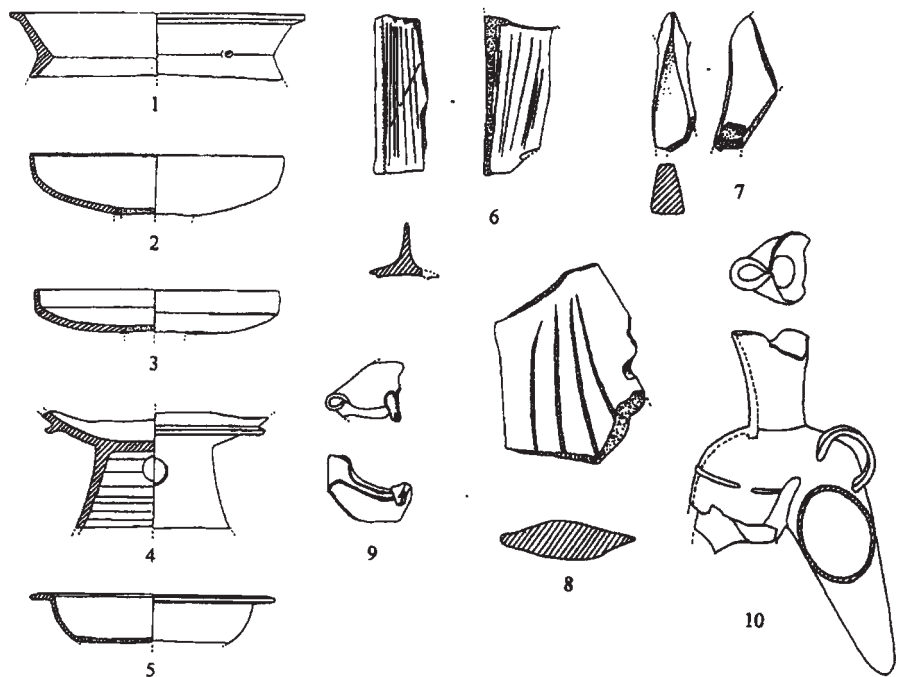
广富林遗址Ⅰ区良渚晚期遗存的堆积较薄,遗迹少,主要见于ⅠT1239、ⅠT1338、ⅠT1339三个探方的第七至第十三层(此三个探方的地层已统一),遗迹单位有H93、TJ12、G36、H128及J14等。根据地层与遗迹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出土器物形

态、组合的变化,可分为三组两段。

第一、二组归为第一段,包括第13—10层和H93、TJ12、G36等单位。第三组为第二段,包括第9—7层及H128、J14等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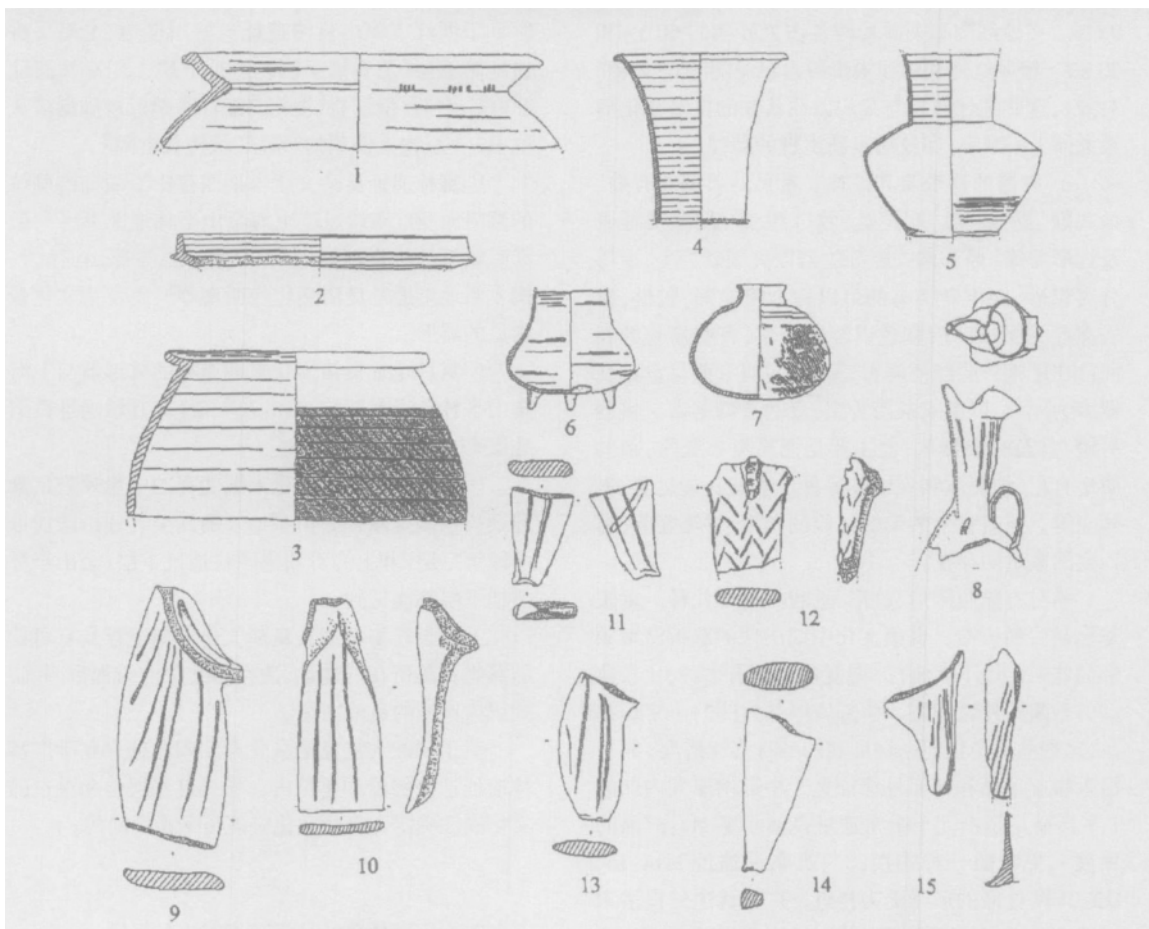
两段器物的特征是:

第一段 常见的典型器有鼎、鼎式甗、豆、圈足盘、贯耳壶、盆、敛口簋、罐、实足盂、缸形器、袋足鬲、器盖等。鼎的沿面斜平,沿下角比较大,T字形鼎足外缘宽于足侧面,缘面内凹。凿形足体粗厚。鱼鳍形鼎足个大宽扁,外缘弧拱偏上。豆有折腹盘和垂棱盘两种,折腹盘较深。袋足鬲,以一种颈部中粗,口部相捏成流,鼓肩,腹腔饱满的为主;另一种颈部较细长,口片相叠成管状流,腹腔也较饱满(图一)。



图一 广富林第一段陶器

1. 鼎(IT1239⑬:12) 2、3、4. 豆(IT1239⑬:24, H93:45, IT1239⑫:57) 5. 圈足盘(IT1239⑬:2)  
6、7、8. 鼎足(IT1239⑩:72, TJ12:65, 24) 9、10. 袋足鬲(H93:59, TJ12:1)



图二 广富林第二段陶器

1. 鼎(H128:43) 2. 豆(H128:60) 3. 盘口罐(IT1339⑨:2) 4,5. 高颈壶形器(H128:3,4) 6. 乳丁足器(J4:6)  
7. 印纹罐(J14:4) 8. 紫足鬻(H128:75) 9-15. 鼎足(IT1339⑧:7, IT1338⑧:4, IT1239⑦:226, 223, H128:17, IT1339⑨:5,4)

第二段 常见的典型器有鼎、豆、深腹盘口罐、袋足鬻等。鼎的沿面外缘下斜,有些沿面凹弧,沿下角趋小。T字形鼎足外缘窄于足侧面,与良渚中期的T字形鼎足风格有些类似,但缘面内凹。凿形足体弧曲,变薄。鱼鳍形鼎足个小,外缘弧拱弱化,下移,部分足根内壁出现椭圆形按窝,有些足尖经过按捏。折腹豆盘变浅,垂棱豆数量锐减,极少见。袋足鬻只有颈部较细长形一种,但注水处斜折,斜肩,腹腔萎缩。第一段的很多器物如圈足盘、敛口簋、贯耳壶、实足盃等此时已不见,新出现的器物有深腹盘口罐、印纹陶罐、乳丁足器和高颈壶形器、舌形鼎足等(图二)。

两段器物各自特征明显,但鼎、豆、缸形器、袋足鬻等典型器演化序列连续而清晰,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较紧密,因此将两段划归为一个大期内。

第二段的地层堆积薄弱,遗迹单位少,能够参加

排队的器物较少,很多器物的特征较难把握,因而此段的文化面貌把握存在一定的难度,容易出现偏差,有待今后资料充实而加以修正。

## 二

陶器是日常生活用器物,代表了遗址文化面貌的主导因素,是确定考古学文化性质的一个重要依据。基于此,我们判断上述遗迹单位和层位的属性应该是良渚文化遗存。

作此判断的依据是:

1. 陶器的陶系。广富林遗址这段遗存内出土的陶器陶系有细泥陶、粗泥陶、夹砂陶、夹炭陶、夹蚌陶和印纹硬陶等几种,其中细泥陶占50%,粗泥陶占9.8%,夹砂陶占39.5%,夹蚌陶占0.5%,夹炭陶和印纹硬陶各占0.1%。泥质黑灰陶占细泥陶的58.6%,其次是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各占细泥陶的12.7%和

9.6%。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各占夹砂陶的60.6%和20.8%。粗泥红陶和粗泥褐陶各占粗泥陶的63.2%和31.6%,这些统计数据与我们以往认知的良渚文化陶系大体上一致<sup>②</sup>。印纹陶是新出现的品种。

2. 陶器的器形及其纹饰。常见的典型器有鼎、鼎式甗、豆、罐、盆、圈足盘、敛口簋、袋足鬶、贯耳壶及缸形器等。鼎和鼎式甗等炊器以夹细砂为主,少部分夹粗砂,夹粗砂类有的可以称为粗泥陶,较松,器表多孔,透气性好,陶色以红色为主,有些器物的表面往往还施一层红色陶衣。豆、敛口簋和圈足盘等食器多为泥质,以黑灰陶为主,豆的装饰丰富。盛器有罐、盆及缸形器等,盆主要是泥质黑灰陶,罐的质地有粗、细泥质和夹细砂等种。水器有袋足鬶、贯耳壶等。还有背上装饰梳篦纹的阔把、管流壶等,有一定的数量的存在。

鼎身有鼓腹罐形、盆形、垂腹釜形等几种。垂腹釜形鼎多斜折沿,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双折沿矮领形鼎此时已经不太流行。鼎足的形制有多种,比较典型的是断面外缘加宽、中部增厚并内凹的T字形鼎足,这种鼎足与任何一种形制的鼎身都能搭配。斜折沿垂腹釜形鼎和断面外缘加宽、中部增厚并内凹的T字形鼎足是浙北千金角遗址良渚小墓M3:5<sup>③</sup>鼎的发展或更晚的一种式别,与喇叭浜遗址M14:16、H2:23两件鼎的形制更为接近。广富林遗址良渚末期遗存的鼎的束颈处几乎都有竖向短条和捺窝,这是由于鼎的口片与腹片在粘接时于接合处留下的加固痕迹。鼎的束颈部位采用这种加固工艺最早可以追溯至千金角遗址良渚晚期墓葬M4随葬的一件陶鼎(我在吴家阜工作站曾仔细观察过该件鼎),由此我们得知这是良渚的传统制作工艺,在良渚末期则被广泛应用。

好川墓地的性质经过多年的推敲现已基本定论为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种地方性变体。王明达先生更是明确地认为是良渚文化“好川类型”,它的主体和特征来自良渚文化<sup>④</sup>,器物组合与良渚晚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相同,鼎、簋、圈足盘等陶器的形态特征与桐乡喇叭浜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同类器十分近似<sup>⑤</sup>。“好川类型”确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消除了以往诸多认识上的谬误。广富林遗址良渚末期文化遗存中有很多陶器可以与好川墓地进行对比。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垂棱豆见于好川墓地M60<sup>⑥</sup>和上海青浦果园村遗址下层<sup>⑦</sup>。豆把和圈足盘的圈足上装饰的大圆形镂孔和多边形镂孔同

时见于浙江卞家山良渚遗址<sup>⑧</sup>、好川墓地、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sup>⑨</sup>及青浦果园村遗址下层、广富林遗址M30<sup>⑩</sup>。台阶(祭坛)状镂孔与浙江喇叭浜遗址良渚灰坑H2:1豆把上镂刻的“祭坛”状镂孔雷同<sup>⑪</sup>。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中沿面饰锥刺纹的翻沿泥质红陶罐见于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下层<sup>⑫</sup>、浙江喇叭浜遗址良渚时期的H1和H2、卞家山遗址<sup>⑬</sup>、桐乡新地里遗址良渚文化晚期墓葬<sup>⑭</sup>,是良渚文化最常见的器形。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缸形器与上海金山亭林良渚时期的M16:73<sup>⑮</sup>和江苏寺墩遗址良渚地层<sup>⑯</sup>中出的缸片类似。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中粗颈袋足鬶和细长颈袋足鬶在好川墓地、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丙区第三层<sup>⑰</sup>和上海青浦果园村遗址下层、金山亭林遗址下层都能见到。

上述与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具有可比的器物及其所在的遗址、遗存的文化性质都很明确,共识为典型的良渚文化。

鉴于如此大量良渚文化典型陶器的存在于广富林遗址这些层位和单位内,那么这些层位和单位的文化属性确定为良渚文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 三

关于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的相对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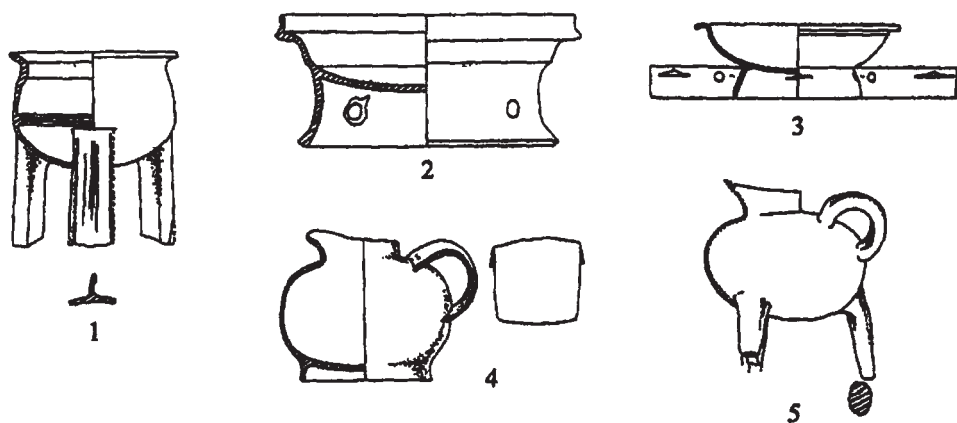
广富林遗址发掘所揭露的地层叠压关系和遗迹单位之间的打破关系为我们判断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

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遗存的层位堆积直接叠压在生土层上及良渚时期的墓葬上,同时又被广富林文化地层叠压或灰坑等遗迹打破,这样我们在野外已经得到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之间的年代早晚关系,即良渚文化早于广富林文化。再结合出土遗物,参照其他遗址,将进一步推断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遗存相对年代的上下限。

上限:

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将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遗存分为二个小段,第一段就是这期良渚文化遗存的上限。

广富林遗址第一段良渚文化遗存包括的层位有IT1239第13--10层,遗迹单位有H93、TJ12、TJ12叠压在H93上面,时间上与广富林遗址M30<sup>⑰</sup>、金山亭林遗址M7、M22、桐乡喇叭浜遗址十八座良渚墓和H1、H2两个灰坑、好川墓地第三期前段、新地里



图三 广富林 M30 出土陶器

1. 鼎 2. 簋 3. 圈足盘 4. 阔把壶 5. 实足盃

遗址 H1 以及江苏吴江龙南遗址 88H1<sup>⑨</sup>等相当。

广富林遗址 M30 随葬 5 件陶器,它们是横大于纵深、足面明显下凹的 T 字形足鼎式甗,子口簋,平折沿下垂圈足盘,鼓肩鼓腹阔把壶,实足盃(图三)。

1988、1990 亭林遗址 M7 和 M22 随葬 T 字形足鼎、高领高圈足尊、阔把壶、高颈扁腹双鼻壶等陶器(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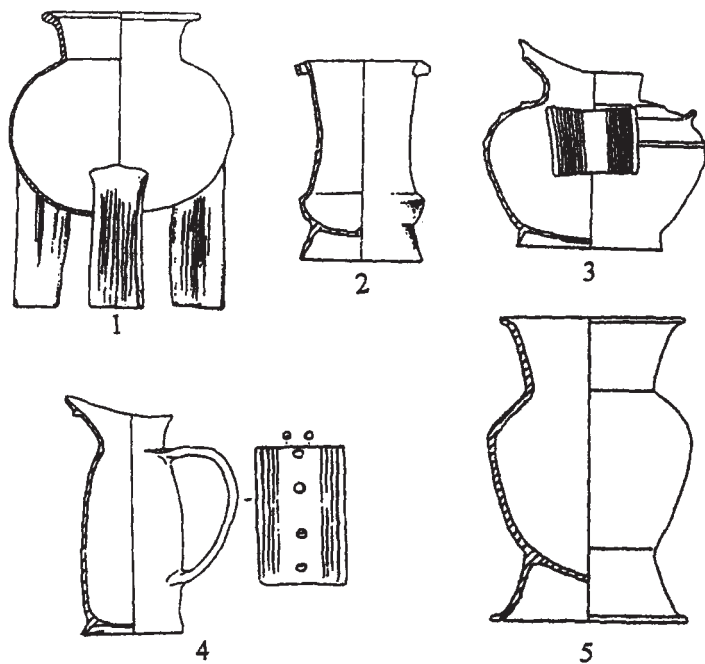
叭喇浜十八座良渚墓随葬陶器组合主要是鼎或鼎式甗、簋、尊、盘等器物,鼎或鼎式甗为鼓腹下垂圈底, T 字形足横大于纵深、足面明显下凹,内敛子口簋,圈足盘宽平折沿,尊为高领高圈足丰肩鼓腹;H1 和 H2 时间早于墓葬,出土的陶器除见于墓葬的器物外,还有垂棱豆、翻沿锥刺纹罐、袋足鬲、实足盃等。

好川墓地第三期前段的墓葬有近 18 座,随葬器物组合以圈足饰大镂孔豆,高领高圈足尊,口部相捏成流、腹部明显袋足丰满的袋足鬲等为主(图五)。

新地里 H1 灰坑内的陶器主要是鼎、豆、圈足盘、袋足鬲、贯耳壶和鼓肩鼓腹杯等。鼎为鼓腹下垂圈底, T 字形足横大于纵深、足面明显下凹,子口豆(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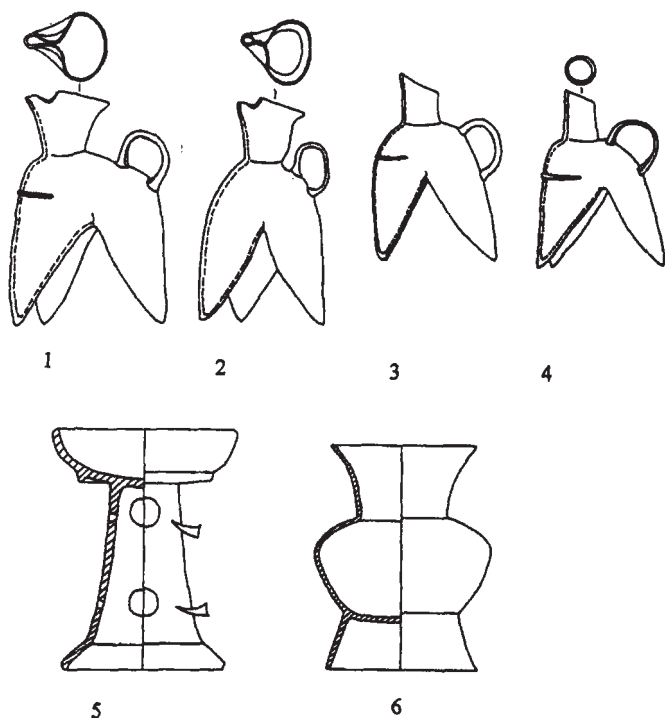
龙南 88H1 灰坑出土的陶器有鼓腹下垂圈底大鱼鳍形足鼎、圈足盘等(图七)。值得一提的是广富林第 10 层、H93 和 TJ12 分别出有一样的高领瓮陶片(图八)。

以上单位内的陶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 T 字形鼎足横宽大于纵深(足外缘宽于足侧面),足面明显下凹呈 Y 字形;鱼鳍形鼎足最厚处偏上;圈足盘宽折沿;泥质红陶罐的口沿饰有锥刺纹;陶尊高领高圈足



图四 亭林遗址出土陶器

1. 鼎(M22:15) 2. 双鼻壶(M7:23)  
3、4 阔把壶(M7:4, M22:7) 5. 尊(M7:30)



图五 好川墓地出土陶器

1. M9:2 2. M27:5 3. M27:5 4. M10:6 5. M3:14 6. M1:6

折沿折肩；簋和豆盘子母口；宽把壶一种是矮胖形腹部特别弧鼓，另一种是瘦高形腹壁近直；双鼻壶颈部高腹部扁浅；袋足鬲腹部明显，袋足较饱满等等，这些特征同样存在于广富林遗址第一段良渚文化遗存。

下限：

广富林遗址第二段良渚文化遗存结束的年代即是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结束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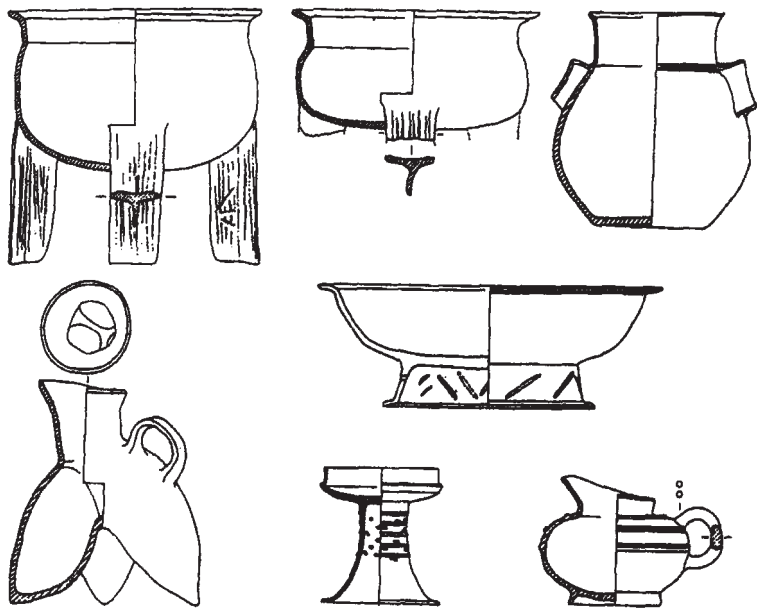
广富林遗址第二段良渚文化遗存包括的层位有 I T1239 第 9-7 层，遗迹单位有 H128、J14、H128 打破 M30。这些层位和遗迹时间上晚于好川墓地第四期后段的 M49、M28，而与浙江绍兴仙人山遗址 H1<sup>②</sup>、新近发掘的浙江钱山漾

遗址第一期遗存<sup>③</sup>及山东龙山文化中后期偏晚阶段的时间相近。

广富林 H128 椭圆形坑口，弧壁下收，圜底，深约 50 厘米，坑壁从上到下至坑底都堆积着一层红烧土块，坑内被陶片覆盖，包含物有垂弧腹、圜底趋平的陶鼎、鱼鳍形鼎足、T 字形鼎足及鼎式甗，垂弧腹鼎身的形制与龙南 88H1:9 差不多，唯鱼鳍形鼎足与仙人山 H1:1 的相似，较龙南 88H1 饱满厚实、最丰满处偏上形鼎足已显单薄、瘦弱之势，最丰满处亦往下移(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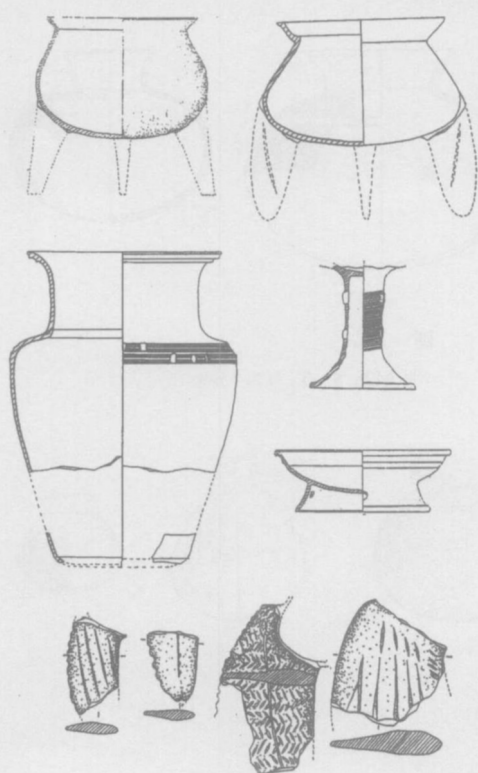
广富林 H128:75 II 式袋足鬲，折沿，颈部细长，口片相叠成流和注，注口壁粘贴小圆泥片以加固，腹腔趋消失，这种形制晚于颈部介于粗颈与细颈之间的好川 M49:19 的 A VI 式袋足鬲，与亭林遗址下层 T4:29、二十世纪 50 年代钱山漾遗址下层<sup>④</sup>的袋足鬲雷同，钱山漾第一期出与广富林 H128:75 II 式袋足鬲一样的鬲口沿片(图一〇)。

J14 是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遗存最晚的一个单位，虽与 H128 没有直接的早晚关系，然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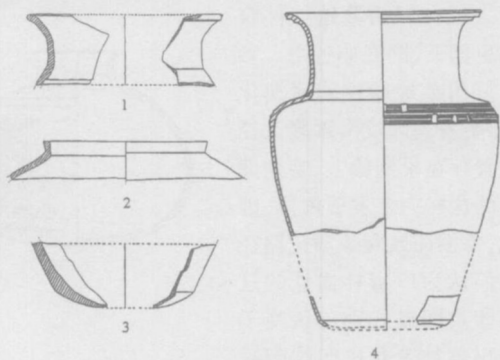


图六 新地里遗址 H1 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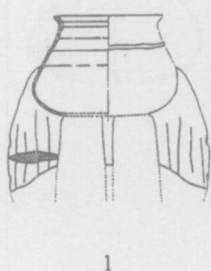


图七 龙南遗址 88H1 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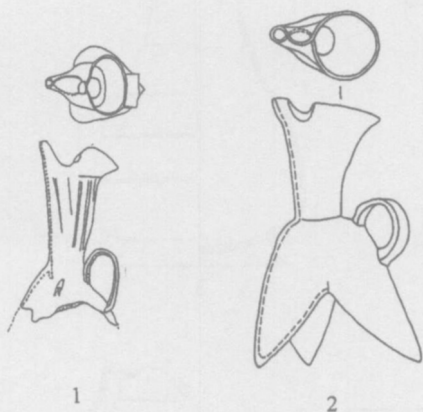
图八

1、2、3 广富林 TJ12:72、40, H93:53 4. 龙南 88H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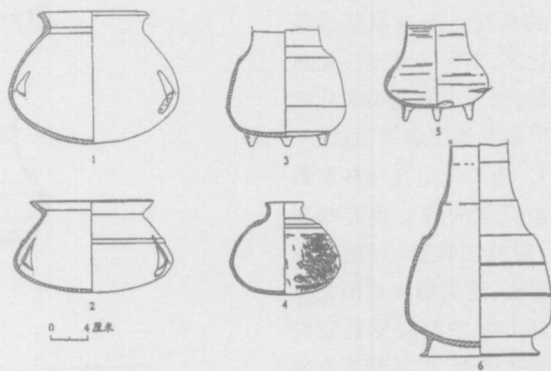
图九

1. 广富林 H128:2 2. 好川 M49:19



图一〇

1. 广富林 H128:75 2. 好川 M49:19



图一一 广富林遗址 J14 出土陶器

1、2 陶鼎 3、5、6 陶壶 4. 印纹陶罐

形制相近。

J14 出土 6 件陶器, 2 件夹砂陶鼎, 1 件印纹陶罐, 3 件泥质黑陶杯形器或盃类器(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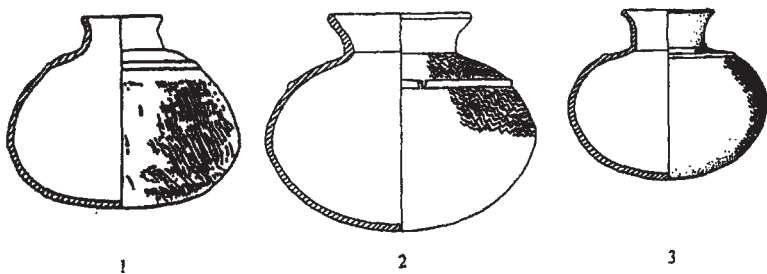
J14:2 夹细砂黑陶鼎, 垂弧腹、底微圜, 鼎足残缺, 器形与龙南 88H1:9、绍兴仙人山 H1:1 基本相似。

J14:4 印纹红陶小罐, 小侈口, 短颈, 颈中部有一

道凸棱, 弧肩上附加一道凸棱, 垂弧腹, 腹大径偏下, 圜底近平, 肩部以上采用“着黑”装饰工艺, 之下满拍印规整的绳纹。类似造型的印纹陶罐见于好川墓地 M28、M49。好川 M28:2 和 M49:15 一件为青灰色硬陶, 另一件夹细砂泥质灰陶, 都是侈口, 束颈, 鼓腹, 圜底, 肩部饰一周附加堆纹, 腹部拍印曲折纹。我们将这三件印纹陶罐放在一起比较以后发现, J14:4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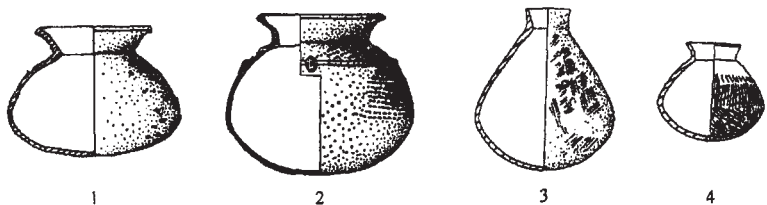
腹大径较好川墓地二件腹部更偏下,圈底亦近平。参考好川墓地印纹陶罐演化序列,发现印纹陶罐腹大径位置存在早期偏上、晚期偏下的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因此,依据印纹陶罐演化路径我们认为广富林遗址的这件印纹陶罐式别应该晚于好川墓地BⅡ式印纹陶罐(图一二)。这类印纹陶罐应该来自南方,与昙石山文化二期遗存、樊城堆文化、福建牛鼻山类型遗存关系较密切,是南方印纹陶文化北传器物<sup>②</sup>(图一三)。

J14:3、5、6三件都是泥质黑陶,烧成温度高,胎质致密,器表经过打磨,亮、黑。J14:5圈底下有三个小乳丁足,近器底有按把手的残痕;J14:3也是圈底下有三个小乳丁足;J14:6圈底下圈足斜外撇。这三件黑陶器的共同点都是器壁线条变化多,不同于良渚文化典型器,而与山东龙山文化的杯形器和盂类器类似(图一四)。山东龙山文化杯形器和盂类器的颈、腹界线明显,腹壁多转折,环把一端近器底,这类器在龙山文化分期方案中没有见到完整的排队序列,但其器形演变轨迹应该与陶鼎及圈足器相一致,可以参照。龙山文化盆形鼎和罐形鼎早期底都较平,至晚期底部下垂、变圈<sup>③</sup>,陶圈足器的圈足早期壁较直或内敛,晚期渐斜外撇<sup>④</sup>(图一五),因此,广富林遗址J14的三件黑陶器应该来自北方,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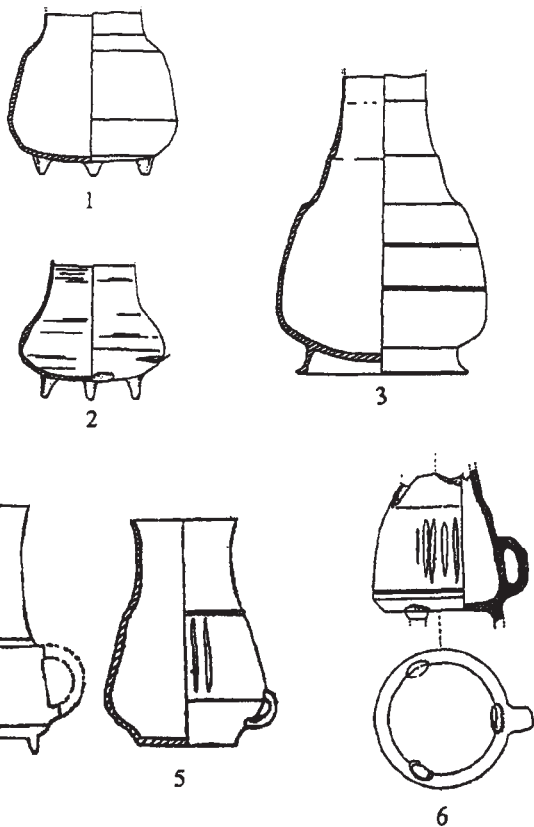
图一二

1. 广富林 J14:4 2. 好川 M28:8 3. 好川 M4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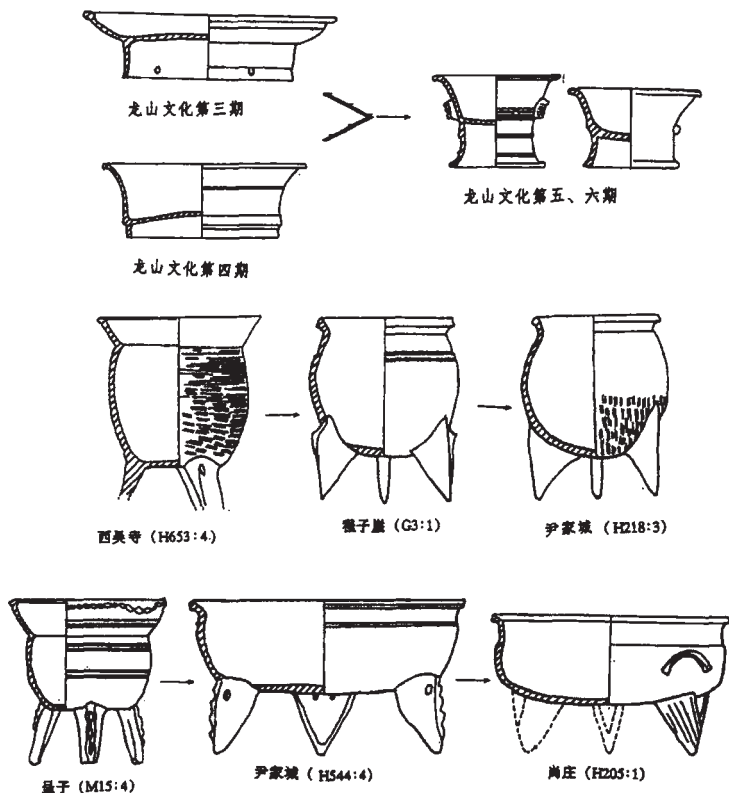
图一三

1、2 牛鼻山 M10:1、M19:2 3、4 昙石山 M120:3、M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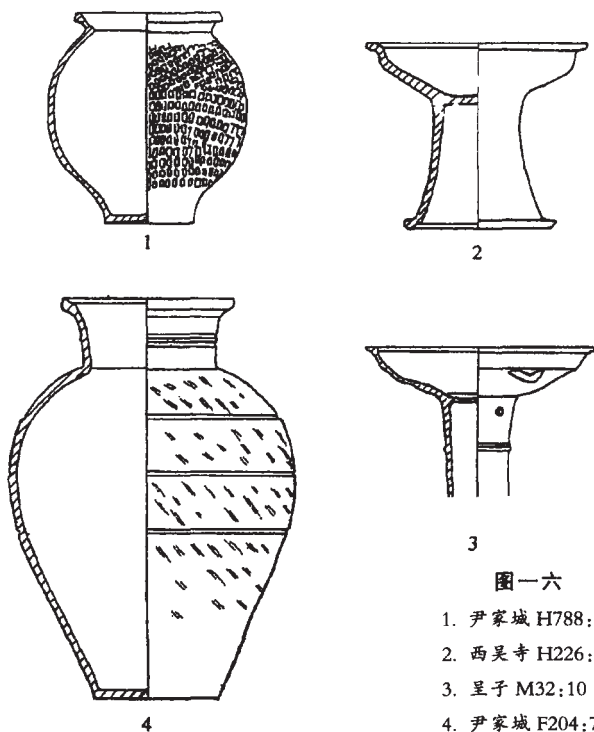


图一四

1、2、3 广富林 J14:5、6、3 4、5 两城镇 VI 式杯 6. 两城镇陶残盂



图一五 龙山文化陶器



图一六

1. 尹家城 H788:13
2. 西吴寺 H226:32
3. 呈子 M32:10
4. 尹家城 F204:70

广富林遗址 J14 的遗物虽然只有 6 件,但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大,融汇了多个文化因素,而原有的传统文化——良渚文化被不断弱化,这是否意味着此时本土的良渚文化已将走到尽头,新的文化正在孕育或已经产生。

在广富林第二段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固有因素已被不断弱化,不同于良渚文化的新因素层出不穷,如:鼎身形制仍延续良渚的传统,鼎足除原有的 T 字形、鱼鳍形足外,新出现鸭嘴状扁凿形、舌形、扁三角形等鼎足,部分鱼鳍形鼎足足根内壁出现椭圆形凹窝,扁三角形足和部分鱼鳍形足尖有浅捺痕,足根内壁椭圆形凹窝、足尖出捺痕广泛流于以后的广富林文化。高领罐、盘口罐、盘内底下凹的豆与山东龙山文化高领罐、中口罐、A 型豆密切相关<sup>⑤</sup>(图一六)。印纹陶圈足罐在好川墓地大多被置于葬具外填土中,说明印纹陶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良渚文化正统谱系,是舶来品。本地土著文化趋于衰落消亡之时,正是南方印纹陶文化少量北上,北方龙山文化强势入侵的时候,最终北方文化入主,取而代之,成为这片土地新的主人。

据上,我们推测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遗存的年代大体处于良渚文化第四期第六段结束阶段<sup>⑥</sup>和山东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其结束时间略晚于好川墓地第五期墓葬,早于广富林文化。以往良渚文化这一



时期的资料发现得较少,认为广富林一类龙山遗存即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在时间接点上存在间隔和空白,随着广富林遗址、钱山漾遗址的工作开展,研究的深入,为我们解决这两个文化之间的时间接点提供了极其重要和翔实材料。

广富林遗址这一期良渚文化时代特征特别强烈,但其很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各家良渚分期方案中较少包含(各家分期方案主要依据墓葬出土器物),因此,我们认为于六段四期的良渚分期方案之后可以再增加二段,是为良渚文化末期阶段。目前良渚文化末期阶段发现的主要是生活类遗存,未见墓葬,器物群组合不明。

已经跨入龙山文化中期偏晚期阶段的良渚文化末期阶段结束时间的绝对年代的数据主要参照海岱龙山文化<sup>②</sup>、兴化南荡类型<sup>③</sup>、广富林文化<sup>④</sup>和昙石山文化二期<sup>⑤</sup>的测年数据,距今4000年之前。

注释:

①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

② 黄宣佩:《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区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1978-198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 王明达:《良渚文化的去向——当前良渚文化研究的一点思考》,《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

⑤、⑬、⑰、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⑥、⑦ 孙维昌:《上海青浦寺前村和果园村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⑧ 卞家山遗址发掘材料尚未发表。承蒙浙江所同行给予参观学习野外发掘工地,谢谢。

⑨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⑩ 资料未发表。

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⑫ 孙维昌:《上海市金山县查山和亭林遗址试

掘》,《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⑬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期。

⑭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10期。

⑮ 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⑯、㉔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⑰ 本部门资料,未发表。

⑱ 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

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年。

㉑、㉓ 福建博物院《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牛鼻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㉔ 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㉕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杨深富、徐淑彬:《山东日照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第8期;刘敦愿:《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㉖ 宋建:《论良渚文明的兴衰过程》,《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良渚文化分期方案有多种,这里采用宋建先生的分期方案。

㉗ 栾丰实《再论良渚文化的年代》,《故宫学术季刊》2003年第4期。

㉘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部、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㉙ 宋建《良渚文化年代之讨论》,《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第2期。